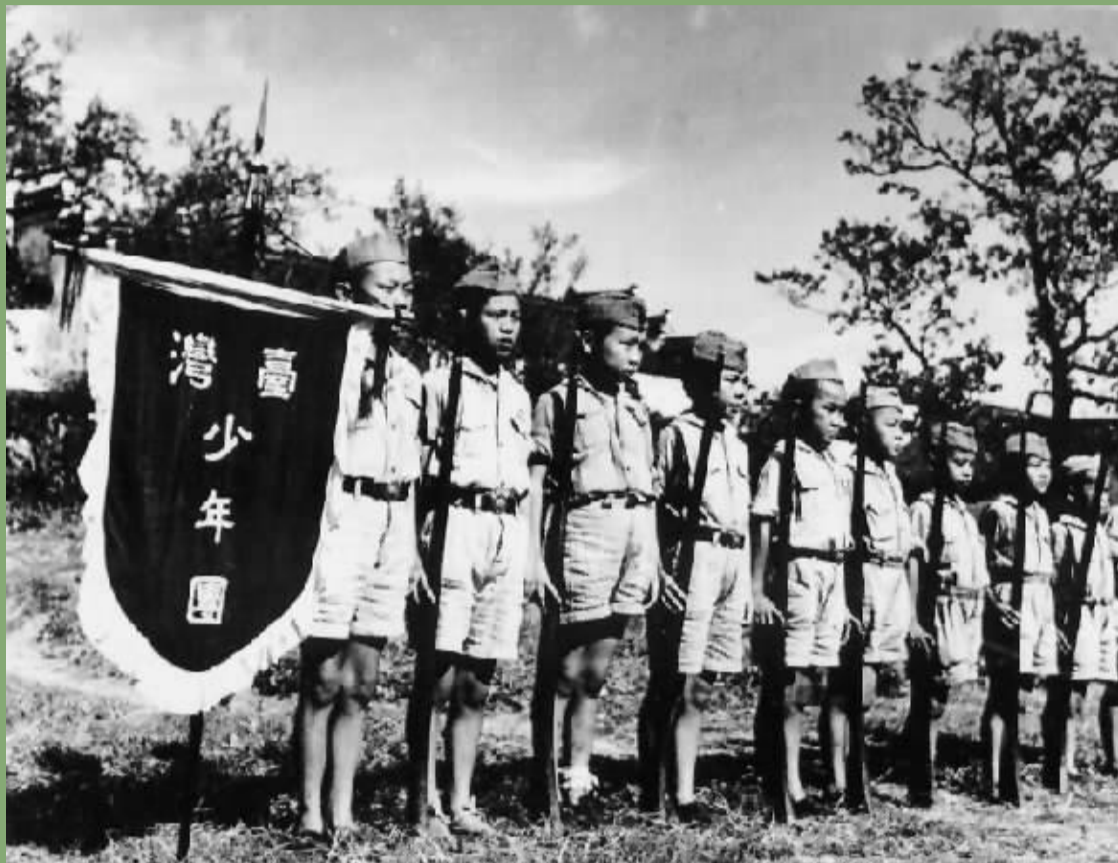


上篇回顾：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台湾热血青年李友邦为反抗日本殖民统治，冒险潜返大陆，入读广州黄埔军校，投身大革命。但因思想上接近左派，卷入“分共清党”风暴，无端遭受牢狱之灾。直至全面抗战爆发，才迎来人生转机，积极组织“台湾义勇队”，重新投入抗日斗争。



“台湾少年团”成员多为十岁左右的孩子，是“台湾义勇队”中一支持殊的力量，因表现出色，当时官方报纸撰文称赞他们是“抗日宣传的有力劲旅”。

先锋话题

一个台湾人的抗日之路 (下)

文 / 杨渡

上回说到，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，出狱后一度在杭州以教授日文勉强谋生的李友邦，决心发动身在大陆的台籍抗日志士，筹组“台湾义勇队”。

创业艰难义勇队

筹组“台湾义勇队”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，李友邦只能不断动用黄埔军校的旧关系，到处请人帮忙，希望国民政府同意立案，提供财政上的补助。

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当年参加过“台湾义勇队”下属组织“台湾少年团”的王正南与高仲明，回忆起五十多年前李友邦在“台民垦殖所”广场上召集他们发表演讲那一夜的情景，仍难免心潮起伏。李友邦对濒临绝境的台湾同乡们说：“你们再住在这里，即使不饿死也会病死，活不下去啊！与其这样死了，不如起来一齐抗日吧！要死也要战斗而死，不能默默死在这里！”

有人问他：“要怎么抗日呢？”李友邦回答说：“大人可以扛起枪上前线，用日语对日本人做宣传，让他们反感。”

“那小孩子怎么办？”有个当父亲的情绪激动地问道。

“小孩子一起来，我们一齐宣传

只要抗日 来者不拒

尽管李友邦明知有些台籍人士是打着“革命”旗号，图谋个人私利名位，但大敌当前，只能求同存异。

由于李友邦以往与国民党左派渊源太深，国民政府对他牵头发起的“台湾义勇队”，并不是全心全意支持的，义勇队虽宣告成立，但申请公文迟迟未获官方批复。

义勇队经费无着落，一开始全靠李友邦自掏腰包，自行设法。最穷困时，每日两餐，早餐稀饭，下午干饭，没有什么像样的菜，只好几个人就着一块豆腐乳下饭。少年团的孩子们正在发育期，特别容易饿，却总是吃不饱。有一次队部转移到乡下，孩子们在一个水塘里抓到些泥鳅、小鱼，都兴奋得跳起来。几十年后，这些“老小孩”回忆起此事，无不视为当年最快乐的时刻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因为我们小孩子也可以生产、可以做贡献了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加菜，吃上荤菜了！”

从一九三八年秋天到一九三九年，李友邦几度往返于桂林与战时首都重庆，多方托关系，特别是找有

李友邦此举，得到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、浙江省政府主席戴绍支持，又获他的狱中难友、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骆耕模具体协助。义勇队的第一项任务，是救援战时因“日特嫌疑身份”被迫迁徙到闽北山区小县崇安垦

荒，处境极为艰难的数百名台胞。刚刚抵达崇安“台民垦殖所”，李友邦便一家一户去看，发现台胞们大多只能在当地孔庙及旁边临时搭建的寮子里安身，根本无法称之为“家”。一些人患了疟疾，躺在床上，盖着厚重的棉被，全身还在发

抖；原本住在福州、厦门这样的大城市，生活优裕的医生，不得不上山“垦荒”，干砍柴、搬石头的粗活，营养不良，自身难保；有些人想私自逃走，却被看管的军人抓回来，用扁担打得流血不起；而极度绝望试图偷自杀了结者，不在少数。

因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数十年，那时候的台湾人，理论上都是日本“国籍”，而大陆上从官方到民众，对“汉奸走狗”深恶痛绝，台湾人的尴尬身份确实非常不利——无论你怎么积极抗日，都免不了被别人怀疑为日本特务。

李友邦所做的一切因此也有着双重意义：就大局而言，台胞共同参与抗日，可以扭转台湾屈辱的殖民地命运；从切身利益出发，也唯有借此才能洗清“台湾歹狗”的恶劣形象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黄昏，闽西龙岩县县城，天下着小

衣“褐”还乡

国民党政府赴台高官里应外合、集体腐败的现象，不仅让李友邦等人寒心，也越来越让台湾普通民众深恶痛绝。

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，意味着被迫与祖国大陆分隔半个世纪的台湾，必然要面对一轮重大的权力转换和社会重组。

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前，李友邦就任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（简称“三青团”）台湾区团部主任。原来早在一九四二年夏天，台湾义勇队移驻浙闽赣交界的闽北南平县时，接到国民党上级指示，必须在队中成立“三青团”，李友邦奉命照办。没想到，“三青团”台湾区团部日后成了台湾光复之初安定岛内局势最重要的一块招牌。

光复接收后，李友邦领导下的这个“团部”，几乎囊括抗日精英及左、右各派的所有重要台籍领导人和骨干。当日本殖民统治失效、国民政府接收机构和干部

到了当父亲的年纪，却依然单身。他安慰孩子们说：“你们不要难过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我会照顾你们。”李友邦身边的友人都知道，那时候每次有人为他介绍女朋友时，他总是拒绝：“我许过愿，台湾没有光复我就不会结婚。”

孩子们并不知道，他们眼中这位抗日英雄和亲切体贴的叔叔，自身处境其实也非常艰难。

筹组“台湾义勇队”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，李友邦只能不断动用黄埔军校的旧关系，到处请人帮忙，希望国民政府同意立案，提供财政上的补助。就连奔赴崇安去拯救受难台胞，动员他们加入义勇队一事，也是通过黄绍竑写介绍信，找到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，才得以办成。陈仪乐得卖这个顺水人

情，因为被拘押流放的这三四百名台胞，杀之并无真正的日本特务罪证，放了又与当初以此名义逮捕的做法不符，正是进退两难呢。李友邦的到来，无形中倒替他找到了一条退路。

尽管李友邦明知有些台籍人士是打着“革命”旗号，图谋个人私利名位，但大敌当前，只能求同存异。他的宗旨是：只要是真心诚意，有助于抗日，不管任何党派，一律欢迎！因此共产党、国民党和无党派台胞，他都来者不拒。

“台湾义勇队”规模得以扩充，台湾嘉义人刘启光（编按：1940年起，刘氏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秘书、台湾工作部主任等职）从重庆派两名干部到义勇队总部驻地浙江金华，谢南光也从上海动员二十多名干部前来加盟。

只要抗日 来者不拒

尽管李友邦明知有些台籍人士是打着“革命”旗号，图谋个人私利名位，但大敌当前，只能求同存异。

由于李友邦以往与国民党左派渊源太深，国民政府对他牵头发起的“台湾义勇队”，并不是全心全意支持的，义勇队虽宣告成立，但申请公文迟迟未获官方批复。

义勇队经费无着落，一开始全靠李友邦自掏腰包，自行设法。最穷困时，每日两餐，早餐稀饭，下午干饭，没有什么像样的菜，只好几个人就着一块豆腐乳下饭。少年团的孩子们正在发育期，特别容易饿，却总是吃不饱。有一次队部转移到乡下，孩子们在一个水塘里抓到些泥鳅、小鱼，都兴奋得跳起来。几十年后，这些“老小孩”回忆起此事，无不视为当年最快乐的时刻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因为我们小孩子也可以生产、可以做贡献了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加菜，吃上荤菜了！”

从一九三八年秋天到一九三九年，李友邦几度往返于桂林与战时首都重庆，多方托关系，特别是找有

“我们胜利了！”

在胜利的时刻，李友邦当然比谁都更想重返家乡，可他还有公务在身，于是委派义勇总队副队长张士德为代表。李友邦还特地要他带一面国旗回台湾。

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召开的开罗会议，是一个确立二战后世界新秩序，同时也决定台湾命运的转折点。各同盟国在会上达成共识，台湾、澎湖、东四省（编按：即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和热河四省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、河北北部部分地区）等遭受日本侵占的土地必须归还中国，朝鲜独立建国。至此，台湾的未来已相当明确：如果中国打赢对日抗战，台湾就可以摆脱殖民地的角色，不必再受日本人的欺侮。

开罗会议公报内容传回国内，台湾义勇队上下闻讯士气为之大振，各界对他们的期望也不断升高。国民政府顺势而为，将台湾义勇队升格为“台湾义勇总队”，李友邦任总队长，他的官阶从原来的少将升格为中将，人事任命由第三战区（对日作战所辖范围主要为江苏、浙江、福建数省）发布。李友邦因此更受瞩目，俨然是未来担当台湾省政的不二人选。

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，台湾义勇队多次在福建沿海参加对日抵抗行动。

比如潜入日人占据的厦门市内张贴反日传单，虎口拔牙，既从政治上给日本侵略者直接心理威胁，让他们知道，中国人在日占区随时可以来去自如，同时也鼓舞当地百姓，为他们带来希望。

他们又利用队员通晓日语的优势，担任情报工作，突击鼓浪屿上的日本海军军火库。还曾配合国民党一个师的部队，对厦门进行武装突击，强有力地震慑打击敌人。

抗战胜利前夕，美军提出了一个轰炸日本军事基地的大规模计划，台湾义勇队奉命参与其中，发挥谙熟日语的优势，负责刺探日方情报，供盟军参考。

随着台湾义勇队在一次次实际作战行动中民间声望不断壮大，不仅身在大陆的台湾人纷纷前来投奔，也吸引厦门、泉州一带的抗日民众纷纷加入，加上潜伏敌后的地下工作者，最多时达七百余人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黄昏，闽西龙岩县县城，天下着小

衣“褐”还乡

国民党政府赴台高官里应外合、集体腐败的现象，不仅让李友邦等人寒心，也越来越让台湾普通民众深恶痛绝。

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，意味着被迫与祖国大陆分隔半个世纪的台湾，必然要面对一轮重大的权力转换和社会重组。

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前，李友邦就任“三民主义青年团”（简称“三青团”）台湾区团部主任。原来早在一九四二年夏天，台湾义勇队移驻浙闽赣交界的闽北南平县时，接到国民党上级指示，必须在队中成立“三青团”，李友邦奉命照办。没想到，“三青团”台湾区团部日后成了台湾光复之初安定岛内局势最重要的一块招牌。

光复接收后，李友邦领导下的这个“团部”，几乎囊括抗日精英及左、右各派的所有重要台籍领导人和骨干。当日本殖民统治失效、国民政府接收机构和干部